

世界名人故事丛书

SHI JIE MING REN GU SHI CONG SHU

杜甫

主编：许庆龙 劳 斌



团结出版社

世界名人故事丛书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章

南

团结出版社

(京)新登字 174 号

责任编辑:吴章胜

封面设计:李 泽

插图:许 艳

世界名人故事丛书

许庆龙 劳 斌 主编

团结出版社出版

(北京书店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信宜市人民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1/32 450印张 9000千字

1996年9月第1版 1996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7—80130—077—7/K·42

全套(108册)总定价:486.00元

前 言

在当今经济社会中，经济大潮滚滚向前，伴随经济潮流而来的各种意识潮流也扑面而来，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现象常有发生。“关心下一代，培育下一代”是我们当之无愧的匹夫之责。

针对青少年求知欲强，鉴赏力差的心理特点，我们特别推出了这套健康、严肃、高雅的《世界名人故事》丛书，以引导青少年在人生道路上端正思想，少走弯路，争做二十一世纪标兵人才。

读者皆知各种各样的名人传记自改革开放以来，如雨后春笋，星罗密布。文艺创作者们各显神通，百花齐放，从各个角度，各个层次对各种“名人”进行了纵横捭阖的记录。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世界名人故事》丛书不仅支持了当今倡导的高雅文化艺术，而且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奉献了一朵小花。

通过名人光怪陆离、五光十色、丰富多姿的人生经历的描述，从而使我们一方面可以从名人们的坎坷经历、奋斗成长的历史中得到启迪、受到激

励；另一方面还可以从他们的人格品质，理论思想中汲取有益的人生经验，使自己的思想得到陶冶和升华。针对以往的名人传记故事，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的绝对化程式，该套丛书作了大量努力，争取做到实事求是，反对“一棒子打死和全黑全白”的绝对化做法，不受条框限制，采取“老灶爷上天——有啥说啥”的方针。

由于世界名人千千万万，“名人”标准各不一致，在选材中，我们也没有受“条框”限制，尽量从各个领域、各类人物中选其一、二。然有许多代表性的人物由于参考资料等欠缺，我们没能选入。

编辑该套丛书的作者，尽量做到了广泛参阅同仁们的有关名人传记的研究成果，为省篇幅，引文和参阅书目一律未加注释，还望同仁们赐教海涵，同时我们也表示对同仁们衷心的感谢。

编 委

一九九六年一月

目 录

杜甫简历	(1)
一、诗书门第	(12)
二、交友远游	(18)
三、再次落第	(48)
四、忧国忧民	(54)
五、逃难生涯	(61)
六、弃官西上	(74)
七、乘舟东下	(98)
八、总结杜甫	(106)

杜甫简历

唐代诗人杜甫是中国历史上极少数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他的诗歌作品达到了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创作的最高水平，其思想和艺术两方面的影响之深远，也是无可伦比的。被后人尊称为“诗圣”。

杜甫字子美，唐玄宗先天元年(712)生于河南巩县一个世代“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官僚地主家庭中。他的祖上曾有为显官的，但从他祖父杜审言以下，已经式微了。杜审言是个著名诗人，武则天时代曾做过膳部员外郎。父亲杜闲，做过兖州司马、奉天(陕西乾县)县令。这样的家庭出身，决定了杜甫年轻时有着相当长的读书游历时期。后来由于国家的动荡和个人仕途的坎坷蹭蹬，使他又有了漂泊贫困的后半生，直到贫病而死，这特殊的人生经历，造就了诗人杜甫。

按照经历和活动的地域，杜甫的一生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天宝四载(745)以前，即杜甫 34 岁以前，基本上是读书游历。四、五岁时寄养于洛阳，六岁寄居河南郾城。七岁时开始学作诗文，所谓“七龄思即壮，开口啄凤凰”(《杜游》)。14 岁即与当时洛阳名士崔尚、魏启心，著名艺人李龟年等交往。19 岁在山西游历了一段时间。20 岁开始了江浙一带的四年游历，到过金陵瓦官寺、姑苏、鉴湖、剡溪等地。24 岁返洛阳参加进士考试，落第。次年开始游齐赵，历时五年，到过兖州、

泰山等地。30岁返归洛阳，在偃师县首阳山下筑庐居住，并与杨怡之女结婚。31岁以后至洛阳。33岁与李白相会，并约定同年秋天同游梁宋（河南开封、商丘一带）。后杜甫又至齐州（济南）、兖州。次年，杜甫与李白、李邕等相会宴饮于齐州历下亭。这一期间，杜甫曾到过北海（山东益都），并往来于兖州与齐州之间，曾与李白访问道人、隐士。同年秋末，杜甫归洛阳，结束了他一生中“裘马颇清狂”的游玩生活，进入困守长安、陷城为官的第二个时期。天宝五载，杜甫35岁，他由洛阳往长安，与岑参、郑虔、王维等人交游。杜甫到长安的目的是谋一官职，以实现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37岁开始向人求荐，生活上也转入困顿，“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间曾去过一趟洛阳。40岁时向玄宗献《三大礼赋》，受到重视，待诏集贤院。天宝十一年春，应诏试文章，没有结果。43岁曾应岑参邀同游襄陂，夏天卜居长安城南下杜，冬天因京师雨灾乏食携家往奉先县安置，只身返回长安。次年十月被任为河西县尉，不就，旋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同年安史乱起。45岁时携家逃难，辗转至鹿州羌村，他自己一人于该年八月赴延州，投奔灵武，中途为叛军所获，送至长安。目睹了叛军的焚烧洗劫行径。46岁那年四月潜奔凤翔，“麻鞋见天子”，被任为左拾遗。次年六月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以上几年往返于郾州、长安、洛阳、华州之间，著名的“三吏”“三别”即作于48岁时。上元元年（760），杜甫四十九岁，移家成都，建草堂，开始了为期十二年的漂泊西南时期。有二三年相对安定的生活，得到严武照拂。51岁移家梓州。53岁又移居阆州，同年应严武邀，复归成都，任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只任职半年，即于次年正月辞职。准备携家东迁时，因

病暂居云安(四川云阳)。五十五岁时迁居夔州(四川奉节县),过了近两年相对富足的生活。五十七岁那年中旬出峡,移居公安,冬天泊舟岳阳城下,翌年三月抵潭州(长沙)。大历五年(770),杜甫五十九岁,该年仲冬,死于潭州至岳阳的船上。

综观杜甫一生,仕途失意使得他的政治抱负无由实现,愤激之情只有发诸诗歌;目睹天灾人祸,生活贫困,又使他的诗篇相当大的部分具有史诗的悲壮与深刻,超越了个人生活感受的局限。他的足迹所及,几乎是大半个中国。且不论杜甫的主观愿望,客观上,他的孜孜矻矻的一生,所有的心血都化作了二千余首诗歌。真正是“文章憎命达”(杜甫《天末怀李白》),杜甫那“青衫老更斥,饿走半九州”的经历(王安石《子美画像》),使他的诗歌创作收到了“可传者千余篇”(白居易《与元九书》)的杰出成就。清朝著名学者浦起龙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玄宗、肃宗、代宗)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少陵编年诗目谱》)这样的评价,杜甫是当之无愧的。

杜甫在唐代以后的地位和影响,人所共识。可是在他生前,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例如,殷璠编《河岳英灵集》,从玄宗开元二年(714)至天宝十二年(735,时杜甫年四十二岁),收李白、高适、岑参等二十四人诗,未选杜甫诗。高仲武选编的《中兴间气集》,选录肃宗、代宗时期(756——779)钱起等26人132首诗,也没有选杜诗。杜甫居住四川时,常怀东游的志向,最终也未能如愿。但他的诗文在江东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只是江东人对杜甫的了解也是不全面的,他们传诵的都是杜甫“戏题剧论”一类诗文,“大雅之作”并没有多少人知道。(参钱谦益注《杜工部集》附录唐樊晃《杜工部小集序》)总之,当时对杜诗的评价是不够公允的。杜甫在《存殁口号》二首之一中

有“人间不解重骅骝”一句，未尝不是一种自己的感慨。当然，诗人自己是有充分自信的。这一点从他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作于三十七岁前后）和《壮游》（作于五十五岁）两首诗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从《奉赠韦左丞文》和《壮游》两首诗，也可以看出杜甫年轻时还是有一定诗文名声的。不然也不会有“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不会有崔尚、魏戾心一班进士出身的人认为他的文才赶得上班固、杨雄。要知道，李邕等人不但文名很高，年纪也比杜甫大。李邕就比杜甫大三十四岁，李白、王维比杜甫大十一岁。与他交情很厚的高适大他九岁，郑虔大他十九岁。正是他自己所说的“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壮游》）这种年龄差距，不能不影响到这些朋友对杜甫的评价会有所节制。有人根据李白的《戏赠杜甫》中“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两句，说李白瞧不起杜甫（孟《本事诗》）。这说法是毫无道理的。撇开年龄差距不论，只看交情，李杜之间也就不浅。天宝三年（744），李白与杜甫在洛阳初次相见，即约定秋间同游梁宋。实际上，此后一年间两人相得甚欢，常在一起，不但游了梁宋，还同游齐赵，游宴访道，诗歌唱酬。天宝四年秋。杜甫要去洛阳，二人在兖州东石门分手。对这次分手，杜甫并未在诗中表现过分惜别，而李白却盼望能有再见机会，“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朋友之间说点玩笑话，不见得就是瞧不起。恰恰相反，以“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李白，思念杜甫写出“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沙丘城下寄杜甫》）不正见出他对杜甫的敬重吗？

酒香不怕巷子深，即使有人不怎么理会杜诗，当时杜诗仍是非常受欢迎的。杜甫晚年，已经有不少人对他表示了非常崇

高的敬意。韦迢《潭州留别杜员外院长》说杜甫“大名诗独步”。郭受在一首叫《杜员外兄垂示诗因作此寄上》的和诗中有这样两句：“春兴不知凡几首？衡阳纸价顿能高。”上句意思是探问杜甫近作情况，大概指大历五年（770）即杜甫生命的最后一年春天坐船从潭州至衡州（衡阳）这几个月的时间；下句用洛阳纸贵的典故。任华一首《杂言寄杜拾遗》敬服之情更是说得淋漓尽致，对杜诗作了生动的比喻，“势攫虎豹，气腾蛟螭。沧海无风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曹刘俯仰惭大敌，沈谢逡巡称小儿。”接着还介绍了杜甫盛名，“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诸人见所作，无不心胆破。”可见在当时某些人的眼里，杜甫诗歌的地位是极高的。

杜甫死后，他的诗歌成就更是得到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充分肯定。韩愈说“李杜文章在，光焰千万丈。”（《调张籍》）元稹说过“杜甫天材颇绝伦”的话，（《酬孝（李）甫见赠十首（其二）》）白居易盛赞杜诗“贯穿古今，睹缕格律，尽工尽善”。（《与元九书》）从此往后，杜诗就被公认为中国诗歌史上的最高峰。杜甫的诗广被刊刻，不少名学者纷纷为之作注。有一项关于杜甫文物的统计数字，可以用来说明这种空前恐怕也是绝后的盛况。1955年成都杜甫草堂已搜集到关于杜甫的诗集和其他资料共有442部，其中不同版本的杜诗就有161部。杜甫的遗迹、祠宇、碑铭的照片、拓片和文物五百多件。文物中有元代以来二十多种不同杜甫画像。（见1955年5月10日《光明日报》）唐代以后，杜诗研究无疑是一大显学，注杜论杜相沿不辍。单是清代，就有许多精研杜诗的名家，例如浦起龙（有《读杜心解》）、仇兆鳌（有《杜诗详注》）、钱谦益（有《钱注杜诗》），等等。至于杜甫“诗圣”的称号，大概起自明代杨慎、汪

士稔谙人。

杜甫诗歌对后代的影响，可以分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两个方面来介绍。

思想内容方面，杜甫对后代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这种影响当然是跟杜甫本身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讲影响离不开对杜诗的归纳。以下分三个方面来谈一谈。

第一，杜甫积极的人生态度。王安石归纳杜甫大半生的景况为“饿走半九州”，是形象的准确的。饱经忧患，一生漂泊，直到生命终结，就连死亡地都是在风雨飘摇的船上。这本身就说明，杜甫具有不肯认命的倔强性格，同时也说明对生活始终存有希望和幻想，实际上是一种乐观的态度。不错，杜甫是有许多的牢骚、愤懑，但决不是灰心失望，也不同于王维晚年的逃避现实，而有些象关汉卿所说的一颗“响当当”的铜豌豆，蒸不熟煮不烂。生活虽然艰难，个人际遇虽然不顺，但总扑不灭心中的希望。杜甫有太多的理想。有研究者指出，杜甫常用“安得”二字是欲得而不能得的一种假想的说法，表现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例如“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洗兵马》）“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如鸟有羽翼，托身白云还故乡！”（《大麦行》）“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昼梦》）这些诗句，更应该理解为杜甫对这些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一直顽强地抱着改变的积极态度。早年，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抱负，到了晚岁，自觉心有余而力不足，仍不肯放弃这种追求，死前一年在写给苏涣待御的诗中还说：“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生命可以终止，理想不能放弃。这就是杜甫的积极人生追求。更

为重要的，他的这种追求绝不局限于个人的需要，而是跟国家、民族、下层人民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不同于一般文人作品常见的患得患失。

杜甫的积极人生观还表现在他的乐观诙谐上。贫困的生活，杜甫对情趣美的感受并没有因之迟钝而麻木，相反，他总时时能够捕捉到这种感受。他是一个敏感富有激情而且具有天真性格的人。代宗广德元年（763）杜甫五十二岁，这年春天他住在梓州。当他听到官军收复河南、河北地区的消息时，禁不住惊喜欲狂，手舞足蹈，唱出他“生平第一首快诗”（浦起龙语）——《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天真的人往往在现实中碰壁，杜甫终于没有回到洛阳，回到故乡！

在诗中，我们看到杜甫一家人的亲情深挚可爱。一首《月夜》把他们夫妻之间的爱写得刻骨铭心：“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在艰苦的岁月里，他的女儿爱美之心不泯，“……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这一种童心楚楚动人，难怪杜甫“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北征》）他的孩子似乎也格外懂事，逃难路上，“小儿强解事，故索苦李餐。”（《彭衙行》）有人认为杜甫专门写这类诙谐滑稽的诗，当然是偏颇的。但要是理解为杜甫性格的一部分，则是可以的。高适说杜甫“心怀百忧复千虑”（《人日寄杜二拾遗》），辩证地看，这大概就是杜甫的苦中作乐吧。

杜甫的这种乐观进取的精神，完全可以被当作人们生活

的一种慰藉，激励人们奋发。在这一点上，白居易、元稹、李绅、张籍等人都深受影响。后来的现实主义诗人，绝大部分都具备这种精神。当然，追究原因，杜甫的思想与儒家传统的“兼善天下”合拍，不无关系。

第二、杜甫的人道主义情怀。杜甫的诗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悦，程度之深之广，都没有第二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杜甫爱人民，尤其爱受压迫受奴役的广大劳苦大众，爱得深沉，爱得执着。杜甫是无愧于人民诗人这种称号的。

杜甫虽然出身地主家庭，但是由于命运坎坷，使他对民间的疾苦有了充分的了解，思想感情上得以贴近。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他唱出“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著名的“三吏”“三别”，反映出各种类型的人民在残酷的兵役下所遭受的痛楚。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现象，杜甫是极气愤的。对造成人民苦难的战争，杜甫是旗帜鲜明地反对的。在《兵车行》中，他讽刺的矛头直指封建最高统治者唐玄宗，揭露他的穷兵黩武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严重灾难。对统治者的奢侈荒淫，杜甫深恶痛绝。可见杜甫的爱憎是非常分明的。

梁启超说杜甫是“情圣”，因为他感情的内容极丰富极真实极深刻，他表情的方法又极熟练，能鞭辟到最深处，准确地打动人。（见其《情圣杜甫》一文）这看法是有见地的。其实这种观点王安石已经表达过了：“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伤屯悼屈止一身，嗟时之人我所羞！所以见公画，再拜涕泗流。推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子美画像》）

杜甫的人道主义精神曾深刻地影响了白居易、王安石等

人，平也是情理中事。

第三，杜甫的爱国思想。应该说，爱国必须以爱民为核心。古人说“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理解杜甫的忠君爱国思想也应当从这个高度着眼。

杜甫的爱国精神主要表现在对安史乱军的痛恨上。因为安史乱军是搞民族分裂的，并且犯下了“杀戮到鸡狗”的罪行，给当时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因此，杜甫在安史之乱以后创作的诗篇中，出现了大量的“胡”“胡虏”“羯胡”“犬戎”等字眼。为了爱国，杜甫不光自己可以舍身，“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他还要求他的朋友们也能够“济时肯杀身”、“临危莫爱身”。

从史实上看，宋以后有不少爱国诗人都是非常喜欢杜诗的。陆游和顾亭林就是其例。他们两人都对杜诗推崇备至。陆游有诗云：“天未丧斯文，杜老乃独出。”（《咏省杜》）顾亭林也说“绝代诗题传子美。”（《济南》）不难想见，杜甫对这两人的思想形成也会是有影响的，另外有不少民族英雄如李纲、宗泽、文天祥等也都受到杜甫爱国精神的感染和鼓舞。这里仅举宗泽为例。《宋史》本传记载，他临死的时候，将领们去看望他。等到将领们出来时，他叹气说：“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没有一句话说到家事，只是再三呼喊“过河”而死。“出师未捷”两句诗出自杜甫为诸葛亮发感叹的《蜀相》。

在艺术形式方面，杜甫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显著的。诗的各种体裁，杜甫都运用自如，并且都有非常出色的作品，堪作后人作诗楷模。杜甫写诗的艺术成就是非常高的，艺术形式与其深刻丰富的思想内容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形成了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具体地说，在形式的适应性，描写客观性，语言的精

炼性，韵律的精严性等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元稹说：“杜甫天材颇绝伦，每寻诗卷似情亲。怜渠直道当时语，不著心源旁古人。”（《酬孝（一作李）甫见赠十首（其二）》）只是说到了杜甫语言上的一方面成就。唐代以后，学习杜甫的人很多，但往往只能学其一点。除白居易、陆游等人外，大多只学其技巧。例如宋代的“江西诗派”就专学杜甫诗用字的讲究来历。这固然反映了后人的片面性，同时也证明了杜甫艺术的博大精深。白居易说“杜甫陈子昂，才名括天地。”

杜甫在艺术上对后代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限于篇幅，这里只指出其中最重的三点，不作详尽的展开论述。

一、撇开乐府旧题，即事名篇。魏晋以后杜甫以前，诗人们往往借用汉乐府旧题来描写时事，或专咏古题。杜甫一改这种“拟古”作法，因事命题，根据描写对象来决定诗的题目。拟古作法是有弊病的，黄生说：“诗人好拟古，譬好妄语者，虽说实话，人亦不信。可以一笑。”（《杜诗说》卷二）话虽然俏皮，还是中肯的。杜甫的这一创新得到了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充分肯定，他们继承了杜甫的这种做法。元稹在《乐府古题序》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就跟白居易等人一同认为杜甫即事名篇的做法是妥当的，并加以学习，不再拟赋古题。这一形式上的革新，使诗歌创作更加切近现实生活，意义是重大的。

二、有选择地采用口语入诗。六朝以来的文人诗一味追求所谓典雅绮丽，导致语言的呆板和贫弱，缺乏生气。杜甫大胆选用民间口语入诗，丰富了诗的语言，加强了诗的表现力，使诗更接近人民大众，让人读起来倍感亲切，即如元稹所说的“每寻诗卷似情亲”。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诗歌应有的审美作用和教育作用。杜甫采用地方俗言，并不只是为了求得“句法欲

老健有英气”(宋释惠洪《冷斋夜话》),而是为了更有力更逼真的反映生活,尤其是下层民众的生活。因此,中唐以后,口语入诗的情况就很普遍了。元稹、白居易、张籍、王建、刘禹锡等人都有这个特点。

三、艺术上不懈的追求精神和忠实于艺术创作的态度。杜甫非常虚心地向前人学习写作经验,他自己说过学习阴铿、何逊的情况,“阴何”最多不过二三流诗人,他都注意学习,更不用说别的文名更大的人,如曹植。杜甫有“诗看子建亲”的诗句。在学习上,杜甫主张“不薄今人爱古人”,主张“转益多师”。(《戏为六绝句》)创作时,他又是呕心沥血的:“新诗改罢自长吟”;不但是长吟,还要“语不惊人死不休!”好朋友李白作诗难免率尔,他都要加以规劝,“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春日忆李白》)杜甫的这种虚心吸取他人经验的做法和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使他的诗歌臻于化境,耐人玩味。白居易说“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杜甫是深会这“天意”的,他的努力没有白费。他的“毫发无遗憾”的艺术追求,我们可以从他的许多诗中看出来。无论到什么时代,杜甫的这些精神都是值得学习的。中晚唐许多“苦吟”诗人在一个方面走向了极端,却是不足为训的。

杜甫在《南征》一诗中说:“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事实不是这样的,他有知音,历史证明,广大的人民是他的知音。

(丁启阵)